

人物春秋

清代儋州知州韩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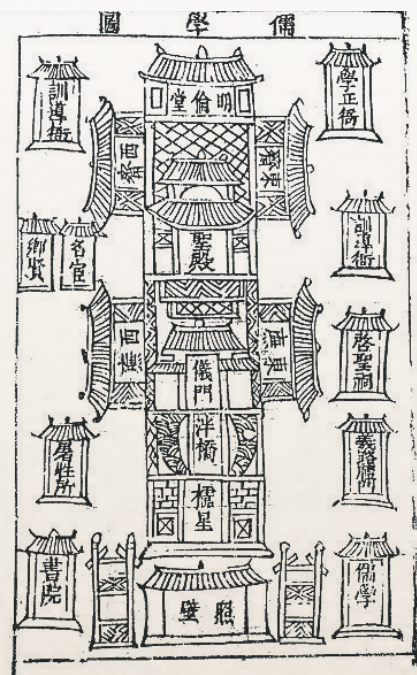
■ 韩国强

儋州历史悠久，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市共登记302处不可移动文物，其中古镇中和就有46处。

20世纪60年代初，郭沫若访问中和，曾在《儋耳行》一诗中感叹“儋耳古城古迹多”。从传世的文献，可以读到历代先贤为保护这些文化遗产，付出了艰辛的汗水。如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建宁军节度副使李光被安置昌化军，先后撰写《迁建儋州学记》《儋耳庙碑》；元延祐四年(1317年)，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大都军行部范梈重建桃榔庵；元泰定四年(1327年)，南宁军判彭应雷重建载酒堂；元至大二年(1309年)，军判任大重建儒学明伦堂。此后，明代知州田章、罗杰、陈荣选、曾邦泰，古城守帅徐真、徐春增；清代知州张继邹、杨焜、李仲极、绅耆邢德、名流李文彬……他们都对保护儋州文物功不可没。

尤其是清代知州韩祐，为保护儋州文物作出重大贡献，值得大书特写。

韩祐，今北京大兴人。民国《儋县志·官师志》载：“韩祐，康熙三十九年知州。裁革谷仓积弊并衙用夫役，裁‘条鞭’收，户房书管收，革除编审朱墨银。四十三年，续修州志。四十六年离任。七年咸思之。祀州名宦。”韩祐在任七年，政绩斐然，县志把他列为“名宦”，实至名归。



清代《儋州志》中的儋州儒学平面图。



《桃榔庵图》。刘运良作

觅旧址，重建“古儋义学”

“古儋义学”为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琼山进士许子伟所建。许子伟幼失怙恃，流浪儋州，被兰村郭岐山夫妇抚养成才。许子伟考中进士后，为报答儋州人的养育之恩，回儋州建义学。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到了清代康熙年间，学舍已倾颓。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韩祐上任儋州知州后，立即寻访古儋义学旧址，看见牛羊出没，草树纷披，过去读书的场所，现在变成放牧的地方。他觉得身为儋州知州，看到这样的景象，应该把振兴学校作为急事。他在叹息之后，决定带头捐出俸银，选择吉日开工，拓土平基，购买材料，开始营建。

重建后的古儋义学，“堂分三进，其前为大门，旁列两室，中为讲堂，旁室倍之后。列文昌座，室如堂数。若由门至堂，由堂至后，左右旷地并留，盖厢房为肄业所自。”重建后的义学再现昔日的风采。

《儋州志》辑录的《义学记》一文，详细地记载了许子伟创建义学的经过及其意义。义学重建落成，州城绅士以功归韩祐，而韩祐却发出一番感慨：“莫为之前，虽善弗彰也，则肇基始创，端赖前人；莫为之后，虽美弗传也，则似续营修，仍须后起有人。以往史兹土者，喜维持，欣作育，时捐费而缮葺，岁出谷以迎师，务使义学常新，历久勿辍，则其功更大矣。”功成不必在我，其美德略见一斑。

道光八年(1828年)，古儋义学更名为“丽泽书院”。

清代琼山进士郑天章为讴歌先贤的功德，曾撰联：“丽泽绕山川，肇启文风常仰许；泽人从学校，广增声价共瞻韩。”这不但是一副藏头联，也是藏尾联，藏头的“丽泽”比较容易看出，藏尾二字，不了解书院历史者，很难理解。上联尾字“许”，指的是许子伟；下联尾字“韩”，即指韩祐。

尊儒学，修复儋州学宫

学宫，即孔庙，俗称叫圣殿。据康熙《儋州志》记载，儋州学宫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设立在城东；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知军兼知州陈适迁到城东南隅；绍熙二年(1191年)，知军叶元璘又搬到城南。据史料记载，儋州学宫是海南最早的孔庙之一，其址历代几经迁徙，最终定于城南。

儋州学宫与其他名胜古迹一样，经不起风雨的摧残，时间久远逐渐崩塌。

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年)，儋州举人曾开撰《议修儋学疏序》倡议重修孔庙，与学正陈祝、训导欧阳霖协捐，孔庙得以修复。

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孔庙在风雨中受损坏。这距离曾开倡修复孔庙又过了43年。韩祐看在眼里，十分痛惜。作为一州之长，他动用公款修复祭祀圣人、教书育人的场所，一点也不过分，但他仍白掏腰包，捐俸修复。

康熙《儋州志》对此事记叙比较简略：“康熙四十三年，正殿东角并后檐及启圣祠，因风雨损坏，知州韩祐捐修。”然而，词简义深，韩祐的人品，及对儒学的尊重，是用实际行动来体现的。

离任前，重建桃榔庵

桃榔庵是苏东坡贬谪儋州的故居，于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五月落成。东坡在《桃榔庵铭并叙》中，描写了当时的恶劣环境及其旷达的情怀。

元代延祐四年(1317年)，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大都军行部范梈寻访桃榔庵旧址，一度重建桃榔庵，让桃榔庵重放异彩。

300多年后，桃榔庵又在风雨中坍塌了。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知州韩祐目睹桃榔庵荒废，情如泉涌，其《重建桃榔庵记》云：“先生忠君爱国，儆言建白，其气节文章超越千古，独以忤时遭谤，万里投荒，栖息无地，不遑守处，几为瘴疫所伐。”韩祐同情东坡遭遇，敬仰苏东坡，于是又捐俸重建桃榔庵。

重建桃榔庵即将竣工时，韩祐离任，但他放心不下，请代署州事的澄迈县令高魁标接着建设。于是，桃榔庵得以恢复昔日的风采。韩、高二君十分高兴，请时任琼州知府的贾棠撰写《重建桃榔庵记》，以记盛事。

《重建桃榔庵记》被刻在石碑上，迄今已是文物一件，碑文明记韩祐“引年乞休”。一个即将离任的官员仍心系重建东坡故居。这是一种什么精神？

桃榔庵已然不存，但是，这块碑记至今仍树立在桃榔庵遗址上。

韩祐在儋州执政七年，守护这片热土，热爱此邦风景，以诗章歌咏“儋州八景”。

他十分重视文物的保护及利用，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仰先生坚白志，居儋旧录续新篇。”(韩祐《儋州八景诗》之八《载海南戴》句)他在政务繁忙之际，仍全力以赴重修《儋州志》，留给后世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桃榔庵、孔庙等饱经韩祐情感的名胜古迹，已在历史的风雨中消逝了身影，只有丽泽书院还存留断垣残壁。

翻阅方志，一页页古老的信息仿佛将人拽回了历史的现场，让人不禁对韩祐这位“老市长”肃然起敬。



韩祐和高魁标重建桃榔庵后，琼州知府贾棠撰写的《重建桃榔庵记》碑刻。林发康摄

古人的“名片”

■ 赵锐

现代人，尤其是商务人士，在交际中时常分发名片，古人也有类似名片的东西，只是在不同朝代，叫法不同而已。

在纸张普及之前，古人在木片上刻刻姓名，以拜谒和刺探对方意见，称之为谒、刺等。名谒较为郑重，多用于下级拜谒上级，材质为宽大的木板；名刺较为随意，多用于亲友和同僚之间，材质多为狭长的木简。纸张普及之后，古人开始用红纸或白纸书写姓名、官衔等信息，有的以绳连结，也有单片使用的，被称为贴、状、纸等。直到清代，“名片”的称呼才正式出现。

古人在“名片”制作上颇为讲究。比如，有人为了凸显自己的高贵身份，或者攀附权贵，会选用名贵材质，有用大张金纸的，有用红绫的，有用织锦的，花样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据记载，明代有个姓茅的官员，每次去拜谒严嵩，名帖都要选用红绫，再用赤金在上面绣字；张居正权势鼎盛时，一些谄媚之徒去拜谒他，呈上的名帖是织锦的，以大红绒为字，再用金线绣蟒龙装点，可谓奢靡至极。

久而久之，“名片”就成了拜谒权贵的“入场券”。只是，这样做也有风险，若有朝一日权贵倒台，那些送过华贵“名片”的人也势必

必受到牵连。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一些聪明人便给自己留了一手。

据《清稗类钞》记载，有位地方官迫于和坤权势，不得不制作高档名帖前去拜谒，但他并不在“纸”上做文章，而是以值钱的珍珠成字，这样，贪心的门卫就把珍珠都抠下来收入自己的腰包，名帖中的敏感字眼也随之被损毁了。和坤倒台后，许多给他送过名帖的人都受了牵连，唯独这位地方官安然无恙。

古人使用起“名片”来很严肃也很正式，一旦发出和接受，便意味着双方都不能随意取消会面，而且，一片一用，还要根据拜谒人和被拜谒人身份、地位、关系等的具体情况，随时改变“名片”的样式。官小的，要使用较大的“名片”，表示谦恭；官大的，要使用较小的“名片”，以示地位；若是呈给上司或长辈，为表尊敬，名字要尽可能写得大一些……

名片是我国古人的一项社交媒介，今天，随着制作成本的降低、电子名片的普及，名片分发的面越来越广，可收获朋友或者合作伙伴的成功率却并没有显著提高，甚至有时候还会因为反感。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与古人相比，我们使用起名片来，少了些郑重、严肃，缺了些真诚和针对性吧。

唐昌玉蕊会 崇敬牡丹期

■ 阿紫

唐代长安，崇敬寺的牡丹、鹤林寺的芍药、唐昌观的玉蕊并称三大“国花”，而以玉蕊最为稀有。前两个很常见，只有玉蕊，始终是云里雾里，几乎没有人见过真容。但是唐宋的众多诗人却留下相当多的诗篇，也留下了很多争议。

据《长安志》载：“安业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乃唐昌公主手植也。”唐昌观的玉蕊花每年花开时节，引得文人仕女纷纷登观，观者如堵，盛况空前。《全唐诗》中就有多篇诗歌记载，诗人杨凝、王建、武元衡、张籍等相约同游唐昌观，就分别留下咏玉蕊的诗篇，白居易的《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中就写到“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说明玉蕊花期在诗人的心目中已经是和牡丹同等值得期待的欣赏佳景了，但是，唐代中叶以后几乎没人见过玉蕊花了，朝代更替，久而久之，更没人说得清玉蕊花是什么样子的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来到海南儋州中和镇七里村游玩，却不期而遇传说中的玉蕊花。只见乡间的湿地中长满了盘根错节的大树，叶子不大，枝叶间悬垂下许多细细的丝条，最神奇的是它的下花朵都是在这条丝条上成串开放，粉白的花朵纤细娇弱，花蕊伸出长长的顶端顶着一个个白色的小玉珠，特别奇妙，闻起来也是

香味扑鼻。

看到旁边的木牌介绍：“玉蕊，分为玉蕊、红花玉蕊。是玉蕊科小乔木植物，穗状花序，顶生，螺旋状排列与枝顶状花序生于枝顶，长达70厘米以上。花茎5—8厘米，疏生于总花序轴上，往往一个花序轴上的许多朵花生同时开放。玉蕊在中国海南常生长在海滨，有时和珊瑚植物混生在一起，因此有人称之为半红树植物，它还具有很强的耐盐性，在潮水经常浸没的地方也能正常生长。玉蕊喜土层深厚富含腐殖质的砂质土壤，但也具较高的耐旱和耐涝能力。”

玉蕊在我国天然分布于海南、台湾、云南、广东和广西等地。那么，海南的玉蕊究竟是不是唐代诗人诗歌里的玉蕊花呢？

一些考古出土的唐朝墓室壁画中，当时男女老少皆穿着单薄，这或许是唐代气候温暖的缘故。竺可桢先生研究认为唐代的气温比现在总体要高出至少2℃。唐朝近300年间，大雪奇寒和下雪的年份都比较少，冬天无雪的年份竟达19次之多，居我国各朝代之冠，属于历史上的一个温暖期，气候相对比较湿润，加上不惜工本的培养，玉蕊是有可能在当时的长安城生存的。

玉蕊花有一个特点，晚间十二点以后开放，白天就纷纷凋落。粉白色的花朵在月光的映衬下，散发出特殊的香味，符合诗人写的“女冠夜觅香

来处，唯有阶前碎月明”；清代方文的《红棋盘豆》诗中“花似扬州玉蕊开，实似南海绉珠来”，说明了玉蕊的产地来自海南或广西一带。

南宋绍兴年间，庐陵周必大在《唐昌玉蕊辨证》中记：“玉蕊花苞初甚微，经月渐大，暮春方八出，如冰丝，上缀金粟，花心复有碧筒，状类胆瓶，其中别抽一英出外，散为十余蕊，犹刻玉然，花名玉药，乃在于此，群芳所未有也。”指出此前宋祁、黄庭坚等人错误认为玉蕊为琼花、杨花属以讹传讹，原因大约是他们从未亲自种过玉蕊花。



儋州市中和镇七里村凋落水面的玉蕊花。张雨摄

学林一叶

汪曾祺与咸菜

■ 成健

咸菜对于贫困时期百姓人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百年前，走遍江苏里下河平原上的城镇乡村，包括汪曾祺的故乡高邮，哪家没有一两只咸菜缸或咸菜坛子，简直无法想象。

汪曾祺的祖母勤劳能干，尽管家境比较富裕，但每到冬天，腌咸菜这些事还是亲力亲为。一种是腌“大咸菜”，用一只能容得下五担水的大缸腌青菜。高邮一带原先没有大白菜，只有青菜，似油菜而大得多，高二尺，一年四季都有。第二种是腌芥菜。第三种是腌“辣菜”，那是将小白菜晾干水分，入芥末同腌，“过年时开坛，色如淡金，辣味冲鼻，极香美”。汪曾祺对祖母腌制的咸菜特别怀念，他说过，“自离家乡，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咸菜”。

“入秋，腌菜，这时青菜正肥。把青菜成担的买来，洗净，晾去水气，下缸。一层菜，一层盐，码实，即成。随吃随取，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春天。腌了四五天的新咸菜很好吃，不咸，细、嫩、脆、甜，难以比拟。”这是汪曾祺笔下腌咸菜的大致过程，他从小耳濡目染，记得明明白白。

在20世纪中叶往后的漫长岁月里，咸菜是艰苦生活坚硬的标志，是人们一天三餐无奈的依靠。大多数时候，咸菜从坛子里现抓现吃，偶尔也会抓一把加水烧汤，正如汪曾祺所描述的那样，暗绿色的咸菜汤咸中带酸，“没有吃惯的人，是不容易引起食欲的”。冬天大雪飘飘，人们怕出门，或者即使出门也没地方去买菜，只能吃咸菜。几时的汪曾祺为此心生抱怨：“一到下雪天，我们就喝咸菜汤，不知是什么道理。”

虽说咸菜不怎么值钱，但那时候穷人吃咸菜也会想着法子白吃。汪曾祺讲过一个笑话：北京的豆汁儿摊子上的咸菜是不算钱的。有个保定老乡坐下，掏出两个馒头，问“豆汁儿多少钱一碗”，卖豆汁儿的告诉他。又问“咸菜呢”，答“咸菜不要钱”。于是他修，“那给我来一碟咸菜”。

汪曾祺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条件其实是很不错的。除了下雪天喝咸菜汤，家里平日吃咸菜，一般都会有其它食材搭配。水乡野鸭多，其肉质细而酥，不像家鸭子肉那么老。汪曾祺介绍说：“野鸭烧咸菜是我们那儿的家常菜。里面的咸菜尤其是佐粥的妙品。”

此外，还有冬笋雪里蕻炒鸡丝、蚕豆炒咸菜、咸菜烧豆腐等，都是咸鲜可口的。有了各种搭配，咸菜就不至于单调乏味了。不过，从前的人们过日子，都懂得勤俭节约。汪曾祺小说里的“八十岁”很有钱，可是平时的食谱非常简单。“菜是一成不变的熬青菜，——有时放两块豆腐。初二、十六打牙祭，有一碗肉或一盘咸菜煮小鲫鱼……有鱼时一人一条——咸菜可不少，也够下饭了。”这个人物形象，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比较典型。

汪曾祺对咸菜很有研究，专门写过文章，并且上升到了文化的层面。他认为：“中国不出咸菜的地方大概不多。各地的咸菜各有特点，互不雷同。”但他最爱吃的还是故乡的咸菜。汪曾祺晚年三次回到高邮，有一次是住在亲戚家，当地的一位父母官前来看望，便留下一道吃饭。汪曾祺特地吩咐亲戚做了一盘“大咸菜煮草鱼头子”，这也是他自己十分喜爱的一道家常菜，到了老家更想吃。

在里下河地区，咸菜是人们舌尖上最家常的味道；而对于汪曾祺来说，咸菜留给他的味觉记忆恐怕也是最深刻的。汪曾祺19岁离开高邮辗转漂流，三四十年后，在北京，在某个寒冷的冬天，他提笔写道：“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我想念家乡的雪。”

文史荟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